

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

费孝通

SOCIOLOGY OF ETHNICITY

主办单位：

中国社会学会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秘书处
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

第 37 期
2005 年 5 月 20 日

纪念费孝通教授专刊

费孝通教授生平

【纪念文章】

从昆明的“魁阁”到北大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马戎

研究部之灵

杨圣敏

人看我看我们 —— 读费孝通译著 *Earthbound China*

于长江

Association of Sociology of Ethnicity, Sociology Society of China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Peking University

费孝通教授生平

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民主同盟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第七、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北京大学教授费孝通同志，因病于2005年4月24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

费孝通同志1910年11月出生于江苏吴江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早年就读于苏州振华女校、东吴大学附属一中。1924年开始发表文章。1928年进入东吴大学医预科学习。后受进步思想影响，于1930年转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习，获学士学位。毕业后受梁漱溟先生之邀，到山东邹平县参加乡村建设运动。不久，考入清华大学社会学及人类学系，成为我国最早在本土获得社会人类学硕士的青年学者。1935年赴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留学，获博士学位。1938年至1946年，任云南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其间，于1943年赴美国学习访问，1946年11月访问英国。1947年到清华大学任教。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清华大学教授、校务委员会委员、副教授，中央民族学院教授、副院长，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专家局副局长等职，以极大的热情投身国家的民族事业和教育事业。“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下放到湖北沙洋“五七”干校。1972年回到中央民族学院，和吴文藻、谢冰心等翻译海斯及穆恩的《世界史》和韦尔斯的《世界史纲》。1978年后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副所长、

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顾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中央民族学院教授，北京大学教授等多项职务。

费孝通同志是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七、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政协第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费孝通同志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1938年，时值中华民族存亡之际，他毅然从英国回国，任教于云南大学社会学系，积极投身于抗日民主运动。他与其他学者发表声明，撰写文章，抨击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一二·一”惨案后，他与云南大学的教授一同发表声明，声援和支持昆明学生的“反内战，争民主”运动。1946年1月，他与其他教育工作者联名致函正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呼吁停止内战，成立联合政府，保障民主权利。李公朴、闻一多被暗杀后，由于生命受到威胁，他被迫离开云南。新中国成立后，他以强烈的爱国热诚积极投身新中国的建设，为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贡献了全部精力和智慧。

费孝通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1949年初，他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五·一”口号，应邀赴西柏坡共商建国大计，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亲切接见，深受鼓舞和教育，从此开始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与共产党亲密合作的光辉一生。同年9月，他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10月1日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费孝通同志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新中国，虽历经坎坷仍矢志不移。

无论是 1957 年被错划为右派，还是“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迫害，都没有动摇他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事业的忠贞信念。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他始终不渝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衷心拥护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极大的热诚积极投身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事业。他同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三代中央领导核心和胡锦涛总书记等中共领导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是中国共产党值得信赖的挚友和诤友。他曾多次表示，正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多党合作事业，才使他为人民作贡献的理想得以真正实现。

费孝通同志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他在担任全国人大、全国政协领导职务期间，积极参加国家政治生活，参与党和国家大政方针的协商。他把领导工作与学术研究、社会活动密切结合起来，通过开展区域发展战略研究，进行“国是咨询”，将参政议政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他早年就树立了“志在富民”的理想，一生孜孜以求。他利用一切机会接触社会变革的实际，深入探讨中国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发展问题、边区与少数民族地区发展问题、城乡关系问题、区域发展问题等，发表了许多具有广泛影响的论著，为推动社会变革，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广交海内外朋友，努力促进两岸学界和其他人士的相互了解、交流，与港台知名学者共同倡导举办了八届“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研讨会。他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之一，赴香港参加香港回归祖国的政权交接仪式。他为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为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为促进祖国的统一大业作出

了重要贡献。

费孝通同志是中国民主同盟卓越的领导人。他 1942 年加入民盟，历任民盟中央委员、常委、副主席。1987 年后任民盟中央主席、民盟中央名誉主席。他在总结自己几十年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共事的经验，总结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演变和新中国成立的经验时，一再强调要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这一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他主持民盟中央工作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紧密围绕国家的中心任务，把为经济建设“出主意、想办法，做好事，做实事”作为民盟的工作思路，并身体力行。多年来，他的足迹遍及祖国的山山水水。他高度关注农村和农民问题，七下甘肃定西，三十余次到江苏吴江调查，帮助当地农民寻找脱贫致富和加快发展的道路。他先后对我国西北地区、西南地区、黄河中上游、黄河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环渤海地区、中原经济协作区、淮海经济协作区、东北地区、京九铁路沿线地区等进行实地调查，代表民盟中央向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提出了许多既符合当地实际、又具有全局意义的重要发展思路与具体建议，尤其是关于上海浦东开发和促进 22 个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实现现代化的建议，受到党和政府的赞同和肯定。他善于发挥民盟在智力上的优势，领导民盟探索参政议政的有效途径。他勇于探索、积极开拓的精神，深入实际、认真实践的作风，以及不凡的学识与智慧、气度与魄力，都深深地感染和激励着民盟的成员。他为开创民盟工作的新局面作出了积极贡献。

费孝通同志是享誉海内外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我国现代社会学和

人类学的创始人。他 1930 年即投身社会学研究，后考入清华大学师从俄籍教授史禄国攻读人类学。1935 年，他与新婚妻子在蜜月中同赴广西大瑶山进行社会调查，历经艰险，调查途中误踏虎阱，腰腿受伤，妻子在寻人救援途中不幸溺水身亡。获救后，他在疗伤期间根据瑶山调查所得资料，整理出版了《花篮瑶社会组织》。留学英国期间，在马林诺斯基教授指导下继续学习社会人类学，完成并出版了英文专著 *Peasants' Life in China*（《江村经济》）。回国后，创办了云南大学——燕京大学社会实地工作站，积极开展农村社会调查，发表了《禄村农田》等一系列关于农村问题的文章，对中国的社会、家庭结构进行了深入研究，培养了一批社会学者。1942 年至 1943 年访美期间，整理和出版了 *Earthbound China*（《云南三村》）。1979 年受中共中央委托主持社会学学科重建工作，任中国社会学学会会长。其间，他出访美国、加拿大，广泛了解国外社会学发展现状，大力培养国内社会学师资，组织编写教材，筹建专业教育和研究机构，并重新开始社会实地调查活动。1985 年他创建了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1987 年他创办了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他主张当代的中国社会学应当是结合中国社会实际和民族特点的社会学，必须立足于中国社会的实际生活，从科学的社会调查入手。他积极倡导实地调查的风气，注重把学术研究和培养人才结合在一起。这期间，他陆续发表了《小城镇大问题》、《三访江村》等多篇著名文章。1992 年他汇集近 10 年的研究成果，出版了《行行重行行——乡镇发展论述》，该著作 1994 年获全国高等学校首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社会学一等奖、1999 年获国家社会科学

基金特别荣誉奖。他通过实地调研和思考，不断提出事关社会进步和发展的重要思想与理论，1987年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1990年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社会和谐观点，1995年提出“文化自觉”的思想，强调世界各民族的文化自觉、文化对话与文化包容。

在社会科学研究事业上的卓越成就为他赢得了国际声誉。1980年他获得了国际应用人类学会该年度马林诺斯基纪念奖，1981年获英国皇家人类学会赫胥黎纪念奖章，1988年获美国“大英百科全书奖”，1993年获日本亚洲文化大奖，1994年获该年度菲律宾拉蒙·麦格赛赛“社会领袖奖”，1998年获“霍英东杰出奖”。此外，他还先后获得英国伦敦经济政治学院授予的荣誉院士、澳门东亚大学社会科学博士、香港大学文学博士等荣誉。1999年至2004年相继出版的《费孝通文集》（16卷本），收集了他从早年至2004年间绝大部分著述，这是他一生重要学术成就的集纳，也是我国社会科学的一项丰硕成果。他的理论在实践中的应用，卓有成效地体现了社会学、人类学的巨大应用价值。他超凡的才智、渊博的学识为人们所钦佩和敬重。

费孝通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是追求真理的一生。他在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中，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富民强国。他以自己的研究工作和社会活动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殚精竭虑，不懈奋斗，直至生命的最后阶段。他高尚的品格、无私奉献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怀念！

【纪念文章】

从昆明的“魁阁”到北大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马戎

1938年在伦敦经济学院得到博士学位后，费孝通先生回到全国抗战、处于危急时刻的祖国。当时不少留学在外的中国学生，由于考虑到当时国内战乱的困难条件，做出了留在外国的选择，在抗战胜利后才回国。当时费先生也有可能留在英国，但他却选择了马上回国，与全国人民一起投身于抗日救国的事业。由于当时战争发展的形势，他是途经越南辗转来到抗战后方昆明的。费先生是一个爱国者，在祖国处于最危难的时刻，他考虑的不是个人安危和工作条件，而是如何能够为国家和民族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作为一个学者，到当时已经转移到后方的大学里教书育人，可以说就是他的战斗岗位。

对于当时西南联大和其他后方大学里教职工困难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在不少的回忆录里已经讲得很多了，菲薄的薪金使教授们的生活十分拮据，图书和实验室的条件很差，而且还要经常躲避日军飞机的轰炸。但是也就是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西南联大和其他后方的大学却培养出了一大批努力有为的青年。当时国家民族危亡的严峻形势激发了年轻学子的爱国奋发的精神，正是这样的精神使他们克服了恶劣的物质条件，使他们后来在各自的领域中做出令人钦佩的贡献。

费先生到昆明后，受聘于云南大学，并创办了“云南大学——燕京大学社会实地工作站”，这是一个对中国社会开展实地调查工作并培养新一代中国社会学者的教学研究基地。为了躲避日军的轰炸，“工作站”后来迁至昆明附近呈贡县的一座祭祀文曲星（魁星）的庙里，这就是“魁阁”这一名称的来历。关于“魁阁”及其创办过程和工作情况，已经发表了不少文章。我想在这里讲的，是我对费先生创建这一研究机构的目的、学术宗旨的个人体会，而且我认为他后来创办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时，所希望的就是在这一新的研究机构中把当年“魁阁”的精神延续下去。

一、

费先生在史禄国教授和马林诺斯基教授指导下，受到了严格规范的学术训练。博士论文 *Peasant Life in China*（《江村经济》）的写作与正式出版，是他学术生涯中的一个里程碑。马林诺斯基教授在该书英文版的“序言”，满怀热情地写到：“这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人在本乡人民中间进行工作的结果。……一个民族研究自己民族的人类学当然是最艰巨的，同时，这也是一个实地调查者的最珍贵的成就。……中国社会学界已独立自发地组织起一场对文化变迁和应用人类学的真正问题进行学术上的攻关。这一学术进攻表达了我梦寐以求的愿望”（费孝通，1986：1-3）。老师的热情肯定无疑给了28岁的费先生以极大的鼓舞，我想这应该是他回国并迅速投入对云南乡村开展实地调查的主要动力之一。

费先生在出国前燕京大学读书时的老师是吴文藻教授，1938年吴文藻教授在云南大学建立了社会学系，费先生回国后去云南大学，可能也是受吴文藻教授的影响。来到云大后，费先生即提出要在云南大学社会学系附设一个研究工作站，得到吴先生的同意。要想长期持续地开展中国农

村的实地调查，没有一个相对固定的研究机构，不培养一个专业化的学术队伍，肯定是不行的。我想这就是费先生创办这一工作站的目的。他当时年仅 28 岁，刚刚从英国回国，满脑子都是从马林诺斯基“席明纳”（seminar）里听来的新研究思路和各国的调查素材，一定很想把这些调查研究思路在中国的社会里试一试，并与其他国家的研究素材和研究成果进行比较。

费先生后来回忆说，“魁阁……是在吴（文藻）老师尽力支持下用来实行他多年的主张为社会学‘开风气，育人才’的实验室。……吸引了一批青年人和我一同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进行内地农村的社会学研究工作。尽管 1940 年底吴老师离开昆明去了重庆，这个小小的魁阁还坚持到抗战胜利，并取得一定的科学成果”（费孝通，2001：51）。

当年参加“魁阁”小组的除主持人费孝通先生外，还有自愿报名参加的张之毅、史国衡、田汝康、谷苞、张宗颖、胡庆钧以及许良光、李有义等人，这是一支有一定规模的高素质的研究队伍。费先生也把马林诺斯基那里的学术风气和研究方法引进了这个小组，“魁阁的学风是从伦敦经济学院人类学系传来的。采取理论与实际密切结合的原则。每个研究人员都有自己的专题，到选定的社区里去进行实地调查，然后在‘席明纳’里进行集体讨论，个人负责编写论文。这种做研究工作的办法确能发挥个人的创造性和得到集体讨论的启发”（费孝通，1990：3）。这是一个年轻的学术团队，它的领头人不到 30 岁；这是一个团结互助的群体，他们在“席明纳”里争辩学术观点，在日常研究工作中互相支持与帮助。费先生谈到他曾亲自刻蜡版印刷，并积极协助安排小组成员们的论文出版。我们都读过钱钟书先生的小说《围城》，书中描写了当时大学教师们间的关系。所以我们可以说，在团结互助这个方面，“魁阁”也为当时和现代的年轻学者树立了一个榜样。

在费先生的亲自指导下，当时的“魁阁”小组成员们完成了一系列社会调查，在丰富的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写出了多篇调查报告。费先生亲自参与调查和撰写的有三篇：《禄村农田》、《易村手工业》和《玉村农业和商业》。其中前两篇在 1943 年曾经由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这三篇则在费孝通教授访美期间由他编入 *Earthbound China*（《云南三村》）一书，1945 年在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这三篇修订后的中文版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在 1990 年出版。“魁阁”小组的其他成员们还完成了许多其他的专题调查报告，后来陆续在国内外出版，引起学界的普遍关注与好评。应当说，“魁阁”虽然前后只有短短的几年，成果是十分丰硕的。

为什么费先生当年回国后不久，就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创办“魁阁”及其调查工作中。他自己在《云南三村》的序中做出了回答。“现在很可能有人会不太明白，为什么一个所谓‘学成归乡的留学生’会一头就钻入农村里去作当时社会上没有人会叫好的社会调查。……我初次去禄村的日子离我从伦敦到达昆明时只相隔两个星期。为什么这样迫不及待？……我当时觉得中国在抗战胜利之后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要解决，那就是我们将建设成怎样的一个国家。在抗日的战场上，我能出的力不多。但是为了解决那个更严重的问题，我有责任，用我所学到的知识，多做一些准备工作。那就是科学地认识中国社会”（费孝通，1990：3）。从这一段话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对祖国命运的关切和肩负的历史责任感。他们头脑里想的是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而每天动手做的却是最基础的研究工作，这些基层社区的调查研究工作只有与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才能够显现出其价值和意义。

总结“魁阁”的特点，可以简略地说，是当时一批优秀的青年学者，结合了自己对国家命运和对学科发展两个方面的关切，采用实地调查的研究方法和“席明纳”的研讨方式，对当时的中

国基层社会开展系统与实证主义的科学研究，从而达到认识中国社会的目的，并以此为建设中国社会在理论上做准备。

二、

1945年日本投降，费先生回到昆明，“魁阁”的研究工作遂告一段落。不久费先生回到北京，任教于清华大学。1952年院系调整后，社会学这个学科被取消，他又转到中央民族学院。后来费先生和其他老一代学者们一起，历经“反右”和“文化大革命”等多次政治运动，直到“四人帮”被粉碎之后，这些老一代的学者们才有可能重新站到学术活动的第一线，参与恢复与重建学科的工作。

费先生于1979年受中央的委托，开始了在中国大陆重建社会学学科的工作。1980年他首先创建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社会学研究所，联系筹办了几届社会学讲习班，并亲自组织一些社会学的专题调查研究工作。但是当时的政治气氛反复多变，在“清理精神污染”运动后不久的1985年，费先生和他的学术助手潘乃谷老师离开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社会学所。在中央统战部、国家教委和北京大学丁石孙校长的支持下，费孝通教授在北京大学创建了社会学研究所，并出任第一任所长。

1985年夏天，也就是北大的这个研究所刚刚成立之后，我为撰写学位论文回国从事田野调查，遇到潘乃谷先生。潘老师在70年代曾是我在大学当“工农兵学员”时期的老师，她向我详细介绍了这个新成立的研究所的情况，并表示希望我毕业后来这个研究所工作。当时我和费先生有过几次交谈，他向我建议去内蒙古赤峰地区做农村牧区的社会调查，了解当地农牧民的生活以及民族交往的情况。后来我在布朗大学的导师Sidney Goldstein教授正式写信，邀请费先生参加我的论文指导小组并具体指导我在国内的田野调查工作。1986年底，布朗大学社会学系正式邀请费先生赴美参加我的论文答辩，我一直感到遗憾的是费先生因其他工作原因没有能够出席，但他后来阅读了我的论文并在答辩评阅书上补签了名。

1987年2月4日，我顺利通过论文答辩，3月即回国到北京大学社会学所报到。从此便在费先生的指导下开展教学与研究，至今已有18个年头。

在这些年里，费先生曾多次向潘老师、我和其他同事谈到“魁阁”精神，他始终希望能够以“魁阁”精神来建设北京大学的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从我记忆的谈话中概括，费先生强调的大致有几个方面。

第一，年轻学者要爱国，要爱自己的国家，关心祖国的命运。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还是落后于西方的，许多民众还是贫穷的，社会学家研究的问题应当是与国家前途、国家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密切相关的专题。但是心里想的是大问题，做却只能从小题目做起，要从小事情中看出大问题，通过对小社区的剖析来理解中国社会的基础结构。

第二，社会学家做学问一定要结合社会中的实际问题，不要在自己关在“象牙之塔”里，做花里胡哨、玩弄名词而实际上没多大用处的死学问，研究的结果应当是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不要“为学问而做学问”。为了紧密联系实际来对改革开放新形势下中国社会变迁进行深入系统的调查研究，他在1988年创建了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他特别关心农民的状况和农村的发展，提出他的农村研究的目的之一是“志在富民”。他也特别关心少数民族的发展，他的“中华民族多

元一体格局”就是通过考古和历史资料来分析中国民族关系的基本结构，探讨中国民族关系的发展趋势。

第三，社会学是一门实证的学科，理论必须联系社会实际，不能只读书，更不能只读“洋书”，一定要自己到基层社区去从事调查研究，“从实求知”，从事实中找出规律，总结出真正符合社会实际的真的知识，只有这样才能“科学地认识中国社会”。后来费先生年纪大了，社会地位高了，从事深入的社会调查有困难了，但他还是坚持到村子里和农户家中去访问，他认为只要面对面听到农民讲话，总会听到一些新鲜的东西、一些在办公室里听汇报所不可能听到的东西。

第四，社会学是来自西方国家的一门学问，西方社会学的理论、研究方法、研究成果是否适用于中国社会，必须经过社会实践的检验，所以需要对中国基层社会开展调查，在研究中要结合中国社会的传统，理解中国社会的传统结构和运行规则，理解中国人传统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在这样的基础上逐步创建出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学理论、核心概念和观点。没有“本土化”或“中国化”的西方社会学，无法解释中国社会的变迁。“魁阁”小组的调查研究工作，就是这样一个方向上去努力的。“魁阁成为实践吴文藻先生实现‘社会学中国化’的主张和‘开风气、育人才’的实验室”（费孝通，1998：513）。

第五，如何实现“社会学中国化”，如何创建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学，需要在学科视野上进行拓展。从吴文藻先生邀请派克教授和布朗教授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讲学，到先安排费先生去清华师从史禄国，又安排他去英国师从马林诺斯基这两位人类学大师，就可以看出吴先生选择的路子是社会学与人类学的互相结合，即通过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方法，了解认识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再把这些知识与西方社会学的成果相比较，吸收西方社会学中有用的部分。所以，在费先生的心目中，中国的社会学与人类学实际上是融合在一起，是不可分的。1992年，费先生提议把北京大学的“社会学研究所”正式更名为“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在费先生的提倡和组织下，自1995年开始我们举办了6期“社会学-人类学高级研讨班”，探讨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以及学科间的交融和互相学习。“魁阁”虽然是社会学研究工作站，但是采用的研究方法是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费先生认为这是对30年代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由吴文藻教授开创的学术风气的延续，他强调这个学术传统应当由今天的北京大学继承下来。

第六，作为中国学者，需要了解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传统，他常说中国的历史能一直延续几千年，是有其道理的，真正的学术大师都是融汇贯通了国学与西学两个方面，才做出成绩。他曾送给我一套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说钱穆先生有自己的创见，值得好好读。他多次表示希望我们能够吸收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精华，在“文化自觉”的基础上进行跨文化对话，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更深刻地理解西方的学说，在比较与融汇中推动学术发展。

第七，他希望能够经常开展“席明纳”式的讨论会，来推进队伍成员们之间的学术交流与互动，互相启发和促进。我们所的成员们经常去费先生的家里，汇报调查中的收获和研究成果，费先生总是提出问题来，引导我们进行讨论。1998年他提出要对社会学的发展历程进行反思和“补课”，不仅自己写出了《补课札记》，还对大家提出了具体的补课要求。这些讨论活动可以说是费先生在新时期开设的“席明纳”。后来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同人组织的研讨会和读书会，也正是在这样的精神指导下展开的。

第八，他十分强调队伍成员之间的团结，要我们多看别人的长处，多看自己的短处，他说当

年“魁阁”小组之所以能够做出一些事来，靠的就是大家的团结。如果彼此看不起，彼此拆台，就什么事情也干不成，所以要想做成事情，一定要有“团队精神”，要学会相互欣赏、彼此合作，这样才能在共同努力下做成大事。

在这些年的日常交往中，费先生经常向我们讲述当年“魁阁”的研究工作，希望今天北京大学的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能够在各方面继承当年“魁阁”的精神与学风。时代虽然不同了，我们今天面临的中国社会已经完全不同不同于 30-40 年代的中国社会，但是“魁阁”的基本精神与学风，仍然应当是我们今天学习的楷模。费先生对我们的期望很高，但十分惭愧的是，这些年里我们在这些方面有时做得并不十分自觉，没有达到先生的期望，今日面对先生的遗像，从内心里感到十分愧对先生多年的教诲。

三、

费先生的心里始终有着一个“魁阁”情结，它代表着他年轻时的人生理想、学术追求和最好的一段研究时光。每当他谈起“魁阁”，他的眼神炯炯发亮，整个人似乎也显得年轻了许多，连他周围的人也难免受到感染，与他呼应，思考“魁阁”精神中所蕴涵的那种鼓舞人们去开创新路、团结奋斗的力量。

前几年费先生组织他的几个学生对当年“魁阁”小组成员的调查地点与专题进行再调查，就是想看看经过半个世纪之后当地的社会发生了哪些变化。可见费先生不仅一直怀念“魁阁”小组当年的研究生活，也关怀着“魁阁”小组成员当年曾经调查过的乡村社区。“魁阁”始终是他与我们谈话中的一个永恒的话题。

费先生谈到“魁阁”时充满了感情，“这一段时间的生活，在我的一生里是值得留恋的。时隔愈久，愈觉得可贵的是当时和几位年轻朋友一起工作时不计困苦，追求理想的那一片真情。以客观形势来说，那正是强敌压境，家乡沦陷之时，战时内地知识分子的生活条件是够严酷的了，但是谁也没有叫过苦，叫过穷，总觉得自己是在做着有意义的事。吃得了苦，耐得了穷，才值得骄傲和自负。我们对自己的国家有信心，对自己的事业有报负。那种一往情深，何等可爱。这段生活在我心中一直是鲜红的，不会忘记的”（费孝通，1990：3）。

费先生已经离我们而去，但是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今后仍将在费先生治学精神的激励和指引下，沿着费先生所开创的学术道路继续走下去。在过去的 20 年里，我们曾有许多机会与先生促膝而坐，谈古论今，共同讨论中国学术发展和学科建设，这些交谈使我们获益非浅，开阔了视野，这些宝贵的时刻和记忆也将永远留存在我们的心里。

参考书目：

费孝通，1986，《江村经济》，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费孝通，1990，《云南三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费孝通，1998，《从实求知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费孝通，2001，《师承·补课·治学》，北京：三联书店。

【纪念文章】

研究部之灵

杨圣敏

世上有一种被称为“场”的东西，真是很难捉摸。如物理学上所讲的电场、磁场。我们明明是既看不见，听不见，也摸不着它，但它们却分明时时刻刻、无处不在地充斥于我们周围。十几年前，社会上流行气功。气功师每每强调大家要一起练功，说这样才会形成“气场”，人在“气场”中练功，比单独练功会加倍受益。当年在“气场”中的感觉，至今令我难忘。当众人聚在一起，跟着气功师作各种吐纳动作的时候，会有一种发热、晕眩的感觉，特别是有时候会感觉到有一股风，一股气，随着多数人的手势飘过来，又飘过去。由此使我联想，当有很多人聚在一起的时候，如果其中多数人有相同或类似的思想、意念或举动，似乎就会形成一个“场”，一个“气场”。这也许就是人们常说的风气。风气传了代，就成了传统。身处这样的场中，人总是会受影响的。但人是以群分的，有不同的类别和档次。而且我始终认为，世上的水土、学派、人群、学校、知识人，都是有贵与贱、雅与俗、生气与死灰、厚重与肤浅的区别的。当他们以类相聚时，就会形成不同类别和档次的“场”。

多年在民族学系讲授“民族学调查方法”，为了配合课堂教学，1997年和2000年，我曾两次带学生在校内各系作了少数民族大学生问卷调查。第一次收回问卷470份，第二次270份。在做完所有740份问卷的统计以后，答案就变成了写满数字的一张纸。问卷中共向学生们提了30几个问题，其中有一个问题是对自己学校的评价。同学们评价的结果如下：

认为学校是一流大学的，占8.5%；

认为学校是二流、三流大学的，占75.1%；

认为学校不入流的，占16.4%。

同学们给学校打了这么低的分，自然主要是针对老师和管理者的，这确实令人汗颜。但我坦然地在其中学习工作了20年，却也没有感觉到多少不适。细想起来，尽管是任职于一个二三流的学校，可我所身处的那个小环境，那个系、研究所，或者说我所在的“场”，却始终有吸引我之处。这个研究所，这个系的前身就是民族学院的研究部。

古人说：“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几十年前，学校二号楼中的研究部，曾经是一个名人辈出，灵气缭绕之所。

1952年，国务院决定建立中央民族学院，于是将原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北平研究院等单位从事民族历史、文化、社会 and 语言等专业研究的一流学者大部分调来民族学院，集中于研究部。

燕园、清华园，那是近一百年来，中华文化培育出的一方圣土，中国名声最著的两个人杰地灵之所在，对中华兴衰始终暗怀重任的最高学府。当其中的一批佼佼者集体来到民族学院，怎么可能不带来那里的灵气？

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创立于1922年。1935年吴文藻任系主任以后，他主张西方理论要结合中国实际，要实现中国化；并主张从理论和方法上把社会学与人类学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他是一个沉默寡言，埋头实干的人。从此，他竭自己毕生之精力贯彻这两项主张。他派他的学生们去美国和欧洲学习，学成归来后，又派他们分别到全国各地去做长期的实地调查。他计划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对中国的每一个角落进行全面的调查与研究。他特别注意对少数民族的调查。如，派林耀华去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区；派李有义去西藏；派陈永龄去新疆。以后，这几位学生都成了有关民族和地区的专家。在他的推动下，燕大社会学系迅速发展成为中国社会学和民族学研究的中心。而七十年来，他的这两项主张，一直是中国的民族学与社会学界遵循的指针。他一生致

力于学科的规划与学生的培养，自己并没有留下很多著作。但他确实是中国民族学与社会学界公认的泰斗级人物。

1951年，中国的高等教育因学习苏联而取消社会学系，燕大社会学系遂分成为民族学系和劳动系。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燕大与北大合并。以燕大民族学系和清华社会学系部分人员为主，建立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又从辅仁大学、中山大学、北平研究院史学所、中国科学院考古所以及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参事室等单位调入有关研究人员。

研究部阵容强大。最初由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费孝通教授负责，原燕京大学代校长翁独健教授任研究部主任兼东北内蒙古研究室主任；原美国国会图书馆研究员冯家升教授任西北研究室主任；后任北京大学副校长的翦伯赞教授任西南研究室主任；原燕京大学民族学系主任林耀华教授任藏族研究室主任；原清华大学教务长、社会学系主任潘光旦教授任中东南研究室主任；汪明禹教授任图书资料室主任。以后又建立了国内少数民族情况研究室，吴文藻教授任主任。民族文物研究室由原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主任杨成志教授任主任。这些人物，几乎个个都是自己研究领域中的首席权威。吴文藻、潘光旦、费孝通和林耀华还将他们在燕京大学的学生带到了研究部，其中有陈永龄、宋蜀华、施联珠、吴恒、朱宁、王辅仁、王晓义、陈凤贤、沈家驹等人。

研究部还有傅乐焕、马学良、王钟翰、吴泽霖、李森、程溯洛、贾敬颜等名重一时的学者。这样的阵容，实际上集中了当时中国大部分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民族语言和民族史学领域的权威人物，真是星光灿烂，盛况空前。

50年代的民族学院，虽然初创不久，却因为拥有研究部而名声鹊起，迅速成为全国著名的学府之一。二号楼中所聚集的这批学者，是用他们震动全国的几项调查和研究成果，赢得了研究部在学术界的地位。他们实际上在短短的几年中间，奠基了新中国民族研究的基础，也为新中国的民族政策的制定提供了依据。特别是他们培养出了一大批从事中国少数民族研究的人才。后来中国相继建立的十几所民族学院的第一批教授大部分是他们的学生。

但在那个政治挂帅的年代，他们属于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知识分子，都有在政治上、世界观上接受改造和再学习的任务。而中国知识分子以天下事为己任的传统，“得其道，不敢独善其身，必以兼济天下”的观念，使他们中的很多人大胆地向政府提出各种建言，其中多人也因此被定成了“右派”。研究部遂成了学校中右派最集中之地。

1956年由研究部抽出部分人建立民族学院历史系，历史系中设民族学专业。其余人员于1958年组成中国科学院民族所。1980年民族学院成立民族研究所，1983年成立民族学系，1986年所、系合并。1994年建立民族学研究院，下设民族学系、民族理论教科部、藏学系、民族博物馆和岩画中心共五个单位。2001年改称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四十余年的雨打风吹，研究部所在的二号楼早已物是人非，但他们留下的那段历史，却难以完全磨灭。

我在儿童时期，曾住在民族学院附近，记得在外面玩耍时和上学的路上，常能遇见研究部的那些人物。有人的子女还是我当时的小学同学，有时就去他们家里玩，留下了许多片断的记忆。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吴文藻、谢冰心夫妇和潘光旦、费孝通这一对师生。

在我的记忆中，吴文藻先生与谢冰心女士总是双双出门散步，潘光旦与费孝通先生一直形影不离。记得当时面容清癯的吴先生总是西服革履，身材挺拔，谢冰心则常着一身合体的旗袍，显得十分年轻典雅。记得那时候吴先生夫妇好像只是默默地走路，不怎么说话，也较少笑容。而潘先生和费先生则好像边走路，边谈笑从容。那时候只是觉得他们有一点与众不同，有一点另类，还不知道他们的故事。几十年过去了，直到我上了大学，才知道他们几位在中国社会学和民族学中的崇高地位，才了解他们的学术思想、政治主张和坎坷的经历。现在回想起来，才真正明白小儿时的我在路上所看到的，真是民族学院历史上两道动人的风景。

印象最深的是1957年，反右运动已波及全国，当时我还未到上学的年龄，但懵懵懂懂听说大

人中间出现了一些坏人，一起玩的小朋友告我其中就有潘光旦、吴文藻和费孝通。我还向他们学会了批判右派分子的顺口溜，“右派分子黑良心，反苏反共反人民……。”当时校园里有很多批判右派分子的大字报，但我不识字，不知写的是是什么，批判的是谁。记得有一天在民族学院校园里看到了一张漫画，画的是架着拐杖的一个胖老头，一边走一边扔炸弹。我看不明白，他哪里来的那么多炸弹，又是炸谁？有人告我那就是攻击党和人民的右派，于是我似乎明白那就是潘光旦。我曾和别的小朋友一起追在他后边，喊着刚学来的顺口溜。有的小朋友还向他们扔小石头。记得他从不回头看我们，总是很从容地继续向前走，而费孝通先生也是一直陪伴在他身边，形影不离。

还记得有一个场面，那是十年后的文化革命时期，潘光旦先生在民院的大操场上拔草，当时我已上了初中，知道他们是“牛鬼蛇神”。记得只有一条腿的潘先生是坐在地上拔草，还有年轻的红卫兵站在后边监督。

后来读了潘先生老友叶笃义先生和他女儿潘乃穆的回忆文章，才知道他在文革中所遭受的非人折磨。但他面对各种迫害，直至临死，没有任何激烈的言词，一直平静而乐观。据叶先生回忆，他死前不久住在医院里，“见了我还是经常那样 smiling face（笑脸）”。当他被医院赶出，准备回家去死的时候，女儿潘乃穆用一辆幼儿乘坐的竹制手推车把他推出病房时，他明明是去赴死，却还“很高兴地向旁边不认识的人招手，如同病愈出院一般。”（潘乃穆“回忆父亲潘光旦”，载陈理主编《潘光旦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0 年）

读到此处，我心情黯然，同时也隐隐想起古人所一直推崇的：“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那么一种“有大勇者”的情怀。有大勇，是因为“其志甚远也”。

今天读潘先生的文集，深感他学术研究领域之广阔，而其中他给人特别深刻印象的，是关于教育的主张。作为教育家，他主张教育就是通过学习来更好地展示人性与实现人生，他批判仅“为物”的教育，认为这仅解决一个“吃饭问题”。他认为：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培养和造就“人格”。他说大学教育应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即“做人”与“做士”。他痛心疾首地指出：有些人，一出校门，一入社会，“就变成了追名逐利，狗苟蝇营之徒。”他认为士的教育第一要立志，即“士要自觉到他的社会担当与责任”；第二要学会“忠恕之道”。

知道了潘先生的坎坷经历，再来读他的文集，不仅深感他作为一个硕学大儒的渊博，而且他的言与行，确实体现了中国士子几千年传统的“仁且勇”的思想和人格。

在反右和文革运动中，费孝通先生都是被批斗的重点对象。在那种情况下，多数人对于“右派”都是避之唯恐不远。右派分子之间，也都互相回避，以免罪上加罪。当时，研究部受迫害最重、处境最悲惨的是潘光旦先生，他生命垂危，已无力自理，而子女又被迫离开他的身边。“士穷乃见节义”。费孝通先生在自身难保的危难之中，始终坚持关照自己的老师潘光旦先生。

潘先生死前不久，家被红卫兵查封，没有足够的御寒衣被，费先生就将自家的衣被拿来送给潘先生用，费先生还亲自给潘先生织了一双毛袜子穿。前几年，一次在潘乃谷老师家作客，潘老师给我看一只葫芦。那是潘先生在世时很喜欢、收藏多年的葫芦，文革中被红卫兵抄家时扔掉，费先生爱屋及乌，他知道那是老师的心爱之物，于是冒险悄悄将其捡回收藏起来，十几年后，交给了潘乃谷老师。潘先生临死前，子女都不在身边，费先生陪着自己的老师，把在死前痛苦挣扎的老师拥在怀里，潘先生在自己学生的怀里停止了呼吸。

文化革命时我正在清华附中读书，不久就上山下乡，到了陕北，直到 1982 年大学毕业后，我考上了民族研究所的研究生，真正来到了儿时曾见到、曾感到奇怪的这些人物中间。当时潘先生已去世多年，而吴先生还在，费先生虽然已调离民族学院，但常来研究所里座谈、聊天、下围棋，林耀华先生是研究所所长。他们当年在燕京大学时教过的学生们都成了研究所的骨干。其中，陈永龄先生任副所长，宋蜀华先生任主管科研工作的副院长。如果从吴先生算起，当时的研究所里已是五世同堂。

古人韩愈在论述不同代学者之间的关系时，曾有这样一段议论：

“士之能享大名、显当世者，莫不有先达之士，负天下之望者为之前焉。士之能垂休光、照后世者，亦莫不有后进之士，负天下之望者为之后焉。莫为之前，虽美而不彰，莫为之后，虽盛而不传。是二人者，未始不相须也，然而千百载乃一相遇焉。”（《与于襄阳书》）

这就是说，再优秀的年轻学者，如无有名望的老师向世人推荐，也难以成名；而再杰出的建树和思想，如无优秀学生的继承，也无法传播下去。这种老师和学生相得益彰的情况，千百年才会一遇。

80年代初，研究所几代师生同堂，朝夕相处，切磋交流，真是实现了负天下望的先达与后进之士难得地汇于一堂的盛况。

50年代初的那种浓浓的士子之气，又回到研究所，回到了二号楼。身处其中，耳濡目染，使我常常感到那里有一股悠悠缭绕的灵气，一种“场”，一种中国士子之气的“场”。记得当时每走进二号楼，似乎就有一种感觉，深感其不同一般的气氛。就像后来学气功时进入了“气场”，而且那是一种“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的场。

在那个场里，我分明感受到了士人特立而独行的自由气息，耿介拔俗的清高与执著，特别是学术研究所依仗的科学民主之精神。

不久，研究所被教育部指定为全国民族院校中唯一的国家级重点学科，建立了第一个博士点，第一个博士后流动站……。

在研究部这些学者之间，并非没有矛盾和冲突；他们个人也并非圣贤，并非没有缺点，但他们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他们的缺点和各种毛病都有一个底线，道德的底线。那就是在中国历代文人中传承了几千年的礼义廉耻信念。如果没有这个底线，这个信念，他们之中的多数又怎么可能抵御各种干扰和诱惑，潜心于学问；又怎么可能对自己所研究的社会现象做出公平的判断和分析，从而留下有价值的作品。

有时会听到一些人对他们之间矛盾的议论，有的人甚至津津乐道，把它写进书中，大肆渲染。我在美国几所大学的人类学系访问时，一些自称熟悉中国同行的美国学者也依据一点道听途说，向我大谈研究部的学者们之间的矛盾，照他们的说法，那似乎是极为严重，水火不容。

在我攻读博士学位期间，追随于导师林耀华先生左右五年，使我得以进一步了解他们之间关系的实质。他们可以有学术上的失误，政治判断上的错误，但他们的出发点都是真诚的，都是为了信仰，为了真理，为了求真，为了事业的追求；绝非蝇营狗苟之徒、阴谋诡计之辈的勾心斗角、追逐名利的争斗。他们之间有矛盾，甚至有斗争，但那完全是君子之争。有一些外人，他们的解释往往从自己庸人的角度、龌龊的心理来理解，往往是夸张的、可笑的、庸俗的，甚至是卑琐的。

1987年，研究所搬到了主北楼6层，似乎那股气，那个场也就随之转移。

现在，研究部的先生们绝大多数已经故去或退休了，那个场似乎也在削弱。但无论如何，我还是能感到它的存在。那是一股灵气，一股不绝如缕的灵气，“不待生而存，不随死而亡”的灵气。我相信，那些故去的先生们，他们“生而为英，死而为灵”，他们的灵气并未散去，还时常萦绕在我们周围。“灵之来兮如云”（《楚辞·九歌·湘夫人》）。也许在二号楼前散发着氤氲香气的草坪树下，也许在主北楼6层的走廊中，也许在图书馆的阅览室里，每当夜深人静之时，或在熹微晨曦之中，他们会在校园里漂游徘徊，搜寻那些有感性的学子。在他们读书时，沉思时，甚或是睡梦中，仅仅是在悠悠一瞬之间，将这股灵气注入他们的心灵。

于是，研究部的灵气，那种科学的精神、独立自由的学术气氛、不慕荣利特立独行的士子之气得以在这个校园里找到一块土壤，得以继续。

学生们给学校打了很低的分，但校园里还是有一些角落，有一些环境，漂游着研究部的灵气，时时熏吹，给人以灵感和激励。这也许就是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的大学，但始终还有几个全国都承认的一流的专业，有时还能够做出一流成果、培养出少数一流学生的原因吧。愿研究部之灵永存。

【纪念文章】

人看我看我们

——读费孝通译著 *Earthbound China*¹

于长江

中国近现代社会科学的发展，源自于19世纪末试图引进西方社会思想解决中国困境的努力，这种理论渊源与现实对象的分离，使得中国的学术，始终摆脱不掉西方中心的影子——引进、照搬、争论、修正、吸收、批判、否定、赶超、再引进……人们似乎一直忙于“西学东渐”过程中学术对象和范式的适应性转换。但另一方面，中国学术又不断生成自主独立的冲动，比如30年代，社会学界吴文藻先生提出的“社会学中国化”，反映出当时中国学术界反思和力图改变现状的心态——希望基于中国社会经验和现状来确立自主的主体性的学术取向、兴趣、标准和范式，不仅要把各种思想从西方引入到中国，还要把中国的学术经验，反过来输出到西方。

在30、40年代的诸多学术著作中，费孝通和张之毅先生关于“云南三村”的研究报告，是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这三个报告本来用中文写成，后来由费孝通先生编译成英文，在这种语言和读者的转换中，体现出中国学术面对的这种“中-西”二分的境遇和中国学者的努力，对于我们理解中国学术的特殊本质和当前中国学术主体性的构建，具有一定意义。

一、东西方之间

费孝通先生晚年非常关注世界上不同文明、文化之间交流理解的问题，提出“文化自觉”和“美美与共”的思想。作为一个实践取向的学者，费孝通先生的学术思考，从来不停留在纯粹思辨想象阶段，他提出的各种命题，永远伴着可能性和可行性的考量。跨文化交流也是一样，费孝通先生其实一直很强调这种交流的现实操作性，而不仅仅是一种抽象的理念和理想。

费先生本人的成长过程，就已经包含着这种跨文化交流、沟通和“美美与共”的因素。从童年开始，他就生活在一个具有中外交流背景的家庭，很早就开始接触这种中外文化的互动。费先生的父亲费璞安曾经留学日本，从事教育工作，姐姐费达生也曾留学日本，这些家庭成员的经历，对费孝通必然会有一些影响。在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期间，费孝通全面加入到这种跨文化的学术引进工作中，他师从派克、史禄国，接受和吸收大量西方理论、方法论和方法，同时也把某些中国经验，反馈给这些导师，尽管这部分文字记录不多，但可以确定的是，费孝通在赴英国学习之前，就已经相当熟悉西方学者的学术规范和思维习惯，并开始从事中西学术之间的“翻译”工作。

留学英国期间，他本人不仅学习和吸收西方学术思想，也开始把他自己在中国“江村”的研究，编译成博士论文，介绍给西方学术界。此后，他又几次从事这种学术翻译工作，把一些深刻反映中国社会经验的思想成果，译介到英语世界中。这种翻译，不仅是文字转换，也包括着思想和经验的广义的“翻译”过程，它构成费孝通先生学术生涯一个重要的方面，尽管这方面论者不多。在费孝通先生以及其他学者努力下，关于中国乡土社会的几部重要著作均有了英文本，其中费孝通的《江村经济》本来是用英文写的 (*Peasant Life in China*)，后来才翻译成中文 (1986年)；《乡土中国》原文是中文，后翻译成英文 *From the Soil* (1992年)；而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所谓“云南三村” (实际上是《禄村农田》、《易村手工业》和《玉村农业和商业》的合称) 和《昆场劳工》，原文是中文，由费孝通先生本人翻译成英文，*Earthbound China* 和 *China Enters The Machine Age*，这两本书的内容，集中反映了费孝通如何面对英文世界来表述中国学术经验的。此外，费孝通著作的英文版还有 *R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Prospect and Retrospect*、*China's Gentry*、*Toward a People's Anthropology*、*Chinese Village Close-up*、*Small Towns in China* 等等。这些作品中，《云南三村》改编为 *Earthbound China* 的过程，集中体现了这种跨文化学术表达的一些特点。

¹ 英文是 *Earthbound China*，中文译本书名为《云南三村》

二、“双向”的意义

在中西学术交流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能否构成真正意义的“双向”交流。欧美学者长期主导国际学术领域，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现代学术研究起步较晚，几经波折，很多方面还处于积极引进学习的状态，在这种情形下，真正的“双向”是否可能？

从历史经验看，双向与否，很大程度取决于具体操作方式。比如20世纪30年代英美学者与中国的学术交流，并没有形成中国学生一味崇洋或盲目出国等片面的流向，而是出现了积累本土经验的高潮，其中原因之一，在于当时来华的西方学者，是以正常的授课教师的身份来华，承担具体的课程，定位适当。比如派克讲学，就是以“教师”的身份和行为，并不渲染炒作“大师”、“泰斗”之类高深莫测的光环。他只是按照正常要求授课和组织实习，不是抽象宣讲概念理论，而是具体指导和带领同学参与实地研究，在实践中讲授“参与观察”等方法，帮助学生理解芝加哥学派社会学、人类学相结合的研究取向。中国学生不是单方面接受抽象的、脱离现实的“理论”，而是同时收集、积累本土经验……这种中国经验和西方思想方法的结合过程，构成了当时青年学生师从西方教师的一个重要惯例。当时费孝通等学生在派克讲学后，没有急于到美国芝加哥去“朝圣”或“取经”，而是热忱地、不计牺牲地奔赴全国各地从事田野调查，这种由西方教师教学唤起的更为强烈的面向本土的冲动，奠定了当时与西方学术交流的一种重要的心理基础，它对今天的学术和教育发展，仍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某种意义上，1940年代魁阁时期的社会研究，代表着中国在吸收西方学术方法和思想并进行消化吸收之后，开始形成独立的学术主体性，它包含着中国学者特有的处境所激发的特有关注、特有学术动机等等，已经构建起某种独立的研究范式和思想传承。事实上，只有在这种独立的主体意识的基础上，才有可能跟“国际”进行有意义的双向交流。费孝通在 *Earthbound China* 的前言中，罗列出他和他的同学们田野工作的成果，又特别阐明中国当时艰难的战时状况和物质条件等，实际上凸显了中国学术独一无二的属性；以此为平台，才能正常地面对英美读者和学术界。如果没有一个适当的学术主体，就很难与别人进行“交流”，只可能是单方向的灌输或获取，充其量也只是形成一种简单的类似上游和下游产业分工的格局。

因此，魁阁精神包含一种跨文化、跨国家的双向交流的潜质。魁阁学术，首先是由西方学术方法论和方法“激活”的，但它在基本认同和兴趣取向上，又是地道中国的。作为背景的，就是在当时正在进行的惨烈抗战——中国处于绝对劣势的、胜负难料，而大批学子在欧美学成，不假思索地经历种种艰辛，辗转抵达中国政府控制的相对贫困边远的“自由中国”¹，这个事实本身，就构成中国学术的某种重要基础。而费孝通先生对魁阁学术成就的译介，正是把这种生成于中国的独特的学术清流，反过来注入相对成熟和庞杂的西方学术界，成为国际学术共同的精神财富。

三、从“三村”到“China”

1944年费孝通先生访美期间，把魁阁期间田野研究形成的三篇相对独立的中文报告《禄村农田》、《易村手工业》和《玉村农业和商业》合起来，编译成一本英文书，取名 *Earthbound China*，由1945年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成为中国学者和学术走向英语世界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但这本书并不是前三篇报告的简单直译，而是一种典型的“编译”，除了保持基本事实部分之外，其他内容和分析探讨部分，都作了很多增删和调整，使之与英语世界的语境相适应。

Earthbound China 的开篇，是费孝通写的一个“前言”；正文的第一部分，是一篇“介绍”，书的末尾，是一章“结论”，这种方式，固然是一般西方学术著作的通例，但是在“中国-西方”特定的学术场景与内容的转换中，这种“前言”、“介绍”、“结论”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它们担当着一个跨越学术文化背景的桥梁。事实上，对于从中文译介到英文世界的学术著作而言，这些总结概括类的章节的重要性，决不低于作品的内容本身。尽管这些著作的著者——费孝通和张之毅——实际上已经是融汇西方思想和中国经验的学者，但他们原来的中文报告，不可避免地具

¹ 1944年出版的《昆厂劳工》英文版 *China Enters The Machine Age* 的封二封三就印有战时中国“敌领区”、“自由区”的地图。

有中文背景影响，不管是从内容上，还是语气上，会反映出一些以国内读者为假设对象的特点。它们在转换成英文后，针对新的读者语境，形式和内容都要做出相应调整。

比如，原来《云南三村》中《禄村农田》有一个“导言”，《易村手工业》有一个费孝通写的“序”，和一篇张之毅自己写的“调查的经过和方法”，介绍研究主旨、过程、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思考等，可以说是报告内容的提炼和升华，而这些本来分散在不同报告中的内容，在 *Earthbound China* 中，被重新调整编译在英文版“前言”、“介绍”和最后一章“结论”中。

目前常用的中文版的《云南三村》（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是中国社会学重建后出版的，其中最后一篇《玉村的农业和商业》经过张之毅先生大幅改写，与40年代版本有很大不同¹，费先生的序言写于1987年，是一篇温故而知新的文章，通过回顾一些旧事，特别是关于魁阁和张之毅先生的回忆，重点讲这本书相关的社会背景、调查过程、当时人们的活动、心态和精神风貌，特别表达了对张之毅先生的深切怀念。这篇东西的对象，90年代中国社会学重建过程中的相关人士。

Earthbound China 出版于1945年，当时的中文原稿，与上述新版的《云南三村》已经有一些差异，但前两篇的内容基本相同。通过中英文对比，可以看出费先生面对不同社会文化读者的表述方式的不同。针对不同语境，论述的顺序、重点、结构、框架、用语等表达方式都做了一些调整。

费孝通当年面对英文世界，把三篇报告合成一篇，又作出各种调整安排，这种做法本身，就是一种从“中国”到“国际”的转换。当人们观察事物的参照系的边界仅限于“中国”范围内的时候，这三个村庄，就代表三种基本的乡村经济类型，其侧重点，在于不同类型之间的差异和比较；然而，当这些内容被译介到英语主导的国际社会之时，参照系发生全面转换，视野的范围放大了，从中国扩大到“国际”，这时这三个乡村首先被共同视为“中国”的地方性经验，统一在一个共同的“中国性”（Chineseness）之中，并不可避免地纳入“东方-西方”二分的参照系，而它们之间的差异，则成了次一级的问题……，因此，在用英文同西方读者探讨云南三村的时候，必须考虑到这种参照系的变换，同时考虑到西方人的视角和认知习惯，使得西方读者面对这些知识的时候，能够找到一条介入的路径。

四、帮助西方想象中国

1、战争和贫困

Earthbound China 的前言中，费孝通先生并不是仅仅介绍这三个个案研究的来龙去脉，而是从东西方交流谈起（类似于今天的所谓“全球化”概念），介绍中国学术活动的大背景，包括中国一代青年学者田野调查的努力，特别详细描述了抗日战争状态下，未被日本占领的“自由中国”区域内极端艰苦的物质条件下学术界和社会各界的顽强努力²。这些内容，对于当时中国读者来说，无需介绍，因为中国人正身在其中，感同身受，但对于英美读者来说，是十分必要的。依照美国人对待国际事务的习惯和美国媒体运作的状况，当时中国进行的反对日本入侵的殊死战斗，对一般英美平民来说，不过是遥远世界的某个新闻而已，并不会造成太深刻的印象或吸引太多人刻意了解，更谈不上设身处地的共感、共鸣了。因此，这种现实，必须作为中国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背景加以特别介绍。同时，即使没有战争，中国平均低下的经济和物质条件，也是美国大多数读者难以想象和体会的，而不理解这些方面，也很难理解中国学术的基本社会背景。具有长期中西方交往经验的费孝通先生很清楚，中国学者不能想当然地认为或高估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和关注。在现实交流中我们必须假设，一些中国人自己视为熟视无睹、路人皆知的东西，对美国人可能恰恰是闻所未闻的信息，非常有必要主动详细的介绍。

2、从读书到田野

面对新的语境，关于研究方法的介绍，也不能仅限于一般欧美的方法和过程，因为经验研究

¹ 费孝通、张之毅，1990，《云南三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3-4页，2页。

² Fei Hsiao-tung, 1975, *Earthbound China*, Chicago: Midway Reprint. vii 页, x 页, xii-xiii 页。

方法，在中国和在美国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必须以某种方式说明白。在中国，这些方法首先是一种跨文化交流的产物，是来自异文化的东西。广义地说，发展现代意义的社会科学研究，本身就是跟中国传统思维习惯的一种分离¹，这对中国学生和学者来说，是一种特有的心路历程，具有一种深切的心灵体验——接受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和新的感受，改变一些自己熟悉、亲近、自然的东西……对有些人来说，不亚于一种精神洗礼，也伴随着很多痛苦和张力。对于这方面，西方一般读者是很难自己想象得到的，但是不理解这种学术心态，就很难理解中国学术界的特点和现实，也很难理解中国学术与社会的真正关系，因此，所以必须做出特殊的明确地说明。费先生在前言中，特别指出了这个问题，即中国学生在学习西方社会科学中，很大一个难点，在于方法，而不是内容。比如说，中国学生过于偏重读书，而且有某种“读死书”的倾向，这种倾向，不适合现代社会研究。这种对书的态度，不管读什么书都存在，即使是读西方的书，也会倾向于读死书，而西方田野调查方法的输入，是对这种读死书的习惯的一种颠覆，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变化和启发²。这些知识，对于西方读者来说，是十分必要的交待。它有助于西方学者了解中国新一代学者实际上完成了一个什么样子的转变，具有怎样的开创性。也揭示了中国社会激烈转型中，学术界的转型的力度。

3、国际处境

1940年代中国与国际学术对话的另一个重要支点，是中国极为特殊的国际处境。中国学者的云南三村研究，是在中国殊死抵抗日本入侵的战争时期克服重重困难和危险完成的，目的在于为现实抗战和未来建设寻找出路。正是中国迫在眉睫的亡国危险和抗击外来侵略战争的惨烈，深深刺激了中国学者对于自己国家民族的忧患与责任，激发了中国学者深入研究中国、理解中国和尽快制定出中国发展蓝图的强烈冲动。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现代化和发展问题，中国就永远摆脱不了这种岌岌可危的处境。中国学者的这种救国救亡的情怀，是西方学术界不易理解和体会的，因为这些心理，只能发生在一个绝对弱势而又不甘屈服的国家的国家中。那些正在主导着世界的西方强国不存在这种处境，它们即使遭遇另一个强权入侵，也不会因此而产生“研究本国社会”的热情——这是完全不同的机制和不同的境遇的产物。而中国当时的魁阁，就象征着这种弱势民族学术研究的特有精神品质，而对于这种精神的概括、表述和交流，也是当时中国和西方之间沟通交流的一个重要方面，它本身就是中国学术不同于西方，又可以贡献于世界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和亮点，同时也构成了考验译者跨文化表达能力的一个难点。费先生在前言中，辟出相当一部分篇幅用于这方面的介绍³，足见其良苦用心。

五、双重挑战：阐释中国乡村工业

1、基于传统的新思维

“三村”研究最重要的成就，是重构中国社会中“工业”与“乡村”的关系。费孝通等人试图打破一般西方工业化的模式，不再从“工业”与“乡村”之间的互相对立、零和的角度看待这一问题，而是从中国传统农村社会中“农工相辅”的格局出发，构建一种中国本土的解释模式。其要点，在于把乡村中的“农”与“工”的关系，看作一种根本上互补的关系。千百年来，男耕女织，二者本来就是协调的关系，功能上是互补的，只是近代由于西方新技术的出现，特别是分工的、集中的、机器生产的工业模式强行打入中国，破坏了中国传统的农工秩序，才使得这种协调出现了某些破绽。因此，要理解中国现代的工业化，特别是农村与工业化的关系，就应该充分考虑到这种本土社会千百年来一贯的传统产业秩序，这就是真正的中国历史和现实经验。依照这种思路，在农村中，农业和工业等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如何重新回归“协调”的问题。

¹ Fei Hsiao-tung, 1975, *Earthbound China*, Chicago: Midway Reprint. viii 页

² 同上。

³ Fei Hsiao-tung, 1975, *Earthbound China*, Chicago: Midway Reprint. xii 页, 311-312 页。费孝通、张之毅, 1990, 《云南三村》,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3-4 页, 222 页。

当时费孝通所代表的这种学术思潮，是基于“救亡”理念的现实研究的一部分，它强调乡村农业、工业之间的协调和互补性，并把这种理想化的互补关系，扩展到整个农村和城市工业的关系，进而提出中国战后工业化的特有模式，那就是在城市集中全力发展现代重工业（战争的经历，使大家一致认同中国要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观点），同时把某些轻工业和现代工业中可以外包分散生产的部分，都安排到乡村，使乡村传统的工业生产能力，成为国家发展现代重工业的支持与补充，而不是障碍或牺牲品。

这些设想及其背后贯穿着的城乡协调、工农协调的思维，与中国或西方主流社会的思路都不相同，甚至难以沟通。值得注意的是，费孝通等人并不是把这种思路视为一种“制度创新”，而是认为它来自对中国社会和传统的更为准确的把握，他们把这种更为深刻地认识，归因于真正高质量的田野研究。正因为如此，它不是来自任何现成的理论或学说，而是来自现实。这也解释了这种思路的独特性和一般性之间的统一，它最重要的价值之一，就是没有盲从一些长期被视为天经地义的集体-共同幻觉。

然而事实上，这种思考，当时不管是在一般社会主流还是学术思想界，都是有些另类甚至逆向思维的，所以，当时这类学说不管是在中国国内还是在西方学术界，其表达都会遇到很大障碍。

2、独立思想的困境

费孝通等学者在“三村”研究中提出的关于中国乡村产业、乡村发展的基本概念和思路，事实上等于对“中”和“西”两方的常规思维同时提出挑战。它一方面质疑西方视为理所当然的各种关于现代化、城市化、城乡关系的基本认知，暗示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不必要或者不应该被强行肢解和纳入基于西方社会历史经验的那些“工业化”、“城市化”分析框架中；另一方面，这种思路也不同于一般中国人对于城乡关系的理解。

中国社会更深层的问题在于，19世纪后西方的强势入侵不仅在社会和物理层次上造成了一种看似“工业-乡村对立”的事实，而更重要的，是伴随着西方工业扩张，各种与这种“对立”相应的社会思想也大量涌入中国，占据人们的头脑，主导话语权威。除了极少数彻底的所谓“顽固派”之外，绝大多数中国人——不管是民众还是社会精英——都几乎不加思索地、理所当然地接受了这种“中-西”之间、“农-工”之间二分对立的思维方式。这种体系，实际上已经成为支配中国人基本思维的基本概念范畴，不管何种意识形态，在这个意义上没有太大的差别。到20、30年代，这种套用西方概念的想法和做法似乎变成一种“常规”和“常识”，天经地义、毋庸置疑。然而在批评者眼中，这表明对于中国社会的误读或曲解已经形成一种稳定的共识，构成一种错误的“传统”。

而30、40年代费孝通等社会学者“三村”研究中所要质疑和挑战的，恰恰就是这种“理所当然”的思维习惯。这就决定了三村不管是中文版，还是英文版，都面临着中西两方面的冲撞和压力，这是一种中国学术特有的双重跨文化的困境。首先，要打破“工业化西来说”的“常识”，澄清中国农村的工业化，实际上是（指少一定程度上）是中国农村传统“亦农亦工”基本格局的延续，这是中国千百年来的一贯传统，不是在什么新现象；而中国农村的“纯农业化”，反而从来就是一种例外的、短暂的、特殊的历史现象。每当中国农村出现“纯农业化”的局面，肯定是农村凋敝、解体、动荡甚至崩溃的状态。“纯农业化等于贫困化”是中国农村千百年来的一贯的现象和规律。

对于三村研究报告中文版而言，表述的难点在于，独立的认知总是比“套用”更难以为公众接受或理解。鉴于“照搬和套用”已经成为一种相因成习的成规，因此，一种借鉴了西方思想、但又不“照搬”西方的关于中国本土的认知，对很多中国人来说，反而比那些照搬套用的东西更难理解，更难以接受了。

六、“正名”与“正实”

1、中文从概念入手

Earthbound China 关于中国工业传统和特点的阐述，主要安排在该书的“结论”部分，其基本内容，主要来自中文版“易村手工业”部分的序，但是在表述方式上做了很多重要的改变，对整个内容作了很大调整。

中文版序是从张之毅先生的一些个人故事和具体研究过程的描述开始的，有很强的个人回忆色彩，而正文部分，则从分析和修正中国人习以为常的“工业”、“农业”这些概念入手，重新构建关于工农关系的概念¹。这种“正名”，符合中国读者的思维习惯，同时也抓住了这个问题在中国语境下的关键点。鉴于中国一般读者特定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框架，这种对于基本分类、范畴和概念的修正，切中要害，最简捷地直达人们误区之所在，直接解构中国读者的常规思维。

中文版中修正的这两个概念，都是典型的中国人引自西方的概念，本来都是舶来品，而中国人的问题，在于反过来套用人们想象中的这些概念“西方语义”，裁剪现实，构建关于本土的知识，造成了费孝通等人认为的“问题”。因此，费先生和他的同事们主张，中国人对于中国社会的认识要回归到一些事实的基本面；在引进和运用西方概念时（比如“工业”、“农业”时），要真正用来概括中国的社会现实；而这种“现实”，应该是基于实际调查，而不是想当然的。实际研究表明，中国与西方即使有某些看似类似的情况，也不能简单套用理论，而需要深入的实地研究来确认这种相似性的真实意义。比如中国乡村的工业化，如果仅仅看表面的大致情况，与西方工业化历史也有共性，但越是这样，越需要更加警惕。作为社会学者，特别需要注意防止的是这类任职的陷阱。简单套用或误用西方概念，不但不能更好地概括和解释中国现实，反而可能妨碍自己对于中国社会更有价值的认知。

一般而言，中国的很多问题，不是出自基本事实本身，而是源于西方话语霸权下，国人对于某些非本土范畴的盲从、误读和纠缠，形成自我误导，造成人们对某些明显的、简单的事实视而不见，或忽视或曲解，所以“正名”常常显得非常重要。这种正名，其实不过是鼓起勇气打破常规回归那些基本事件和感受本身，它最容易实现的场景，就是田野研究。

2、面向西方的表述

在对英语读者的表述中，费先生从基本数据和事实入手开始阐述，而不是像在中文版中从概念入手。因为西方总体的强势地位，社会科学概念本来就源自西方一般用语，对他们而言不是舶来品，不是新概念，没有特别的原则性或神主牌式的光环，也就没有了那种关系到解释权的不可动摇的语义迷信；这样的语境下，人们一定程度上反而更容易改变对某一概念的定义——只要你列出确凿的事实证据，人们就会对原有概念进行某些修正，不必受到非西方国家各种“西方崇拜”造成的心理障碍。从这个意义上说，在西方，问题不在于正名，而在于“正实”，主要是清楚明白地交待事实。在英文版中，费先生在简单陈述了中国学者的治学态度和学术价值之后，就开始直接引用数据，展开讨论，展示中国农村农民收入中各种来源的比例，用数字说话。对于没有中国背景知识的英美读者来说，数字表达最为清楚明白，一目了然，尽管信息不够完全，但至少可以告诉他们一些基本事实，数字毕竟是世界通用的语言。

3、坦诚的本土关怀

在三村研究报告的中文版和英文版中，费孝通先生都从中国和西方关系的大背景下阐述了中国农民在面对西方工业冲击下不断恶化的状况，但是在《云南三村》中，费先生是面对中国内部的读者，侧重于以农民的视角和立场叙述的，也具有一定感性的成分。但因为是针对国内读者，反而不需要太多强调农民艰辛的一面，因为这已经是家喻户晓的基本常识，所以中文版更多谈到农村贫困化的机制成因，包括特别阐述了国外工业的特权、西方经济侵略、以及这些变化导致中国国内政治不安等问题，而对抗战期间中国的状况和抗战之后中国重建的建言，完全是站在“我群体”内部的中国本位的立场上说话。

而在英文版中，叙述着的身份、语境、对象、场景都发生了变化，作为一个中国学者，面对西方公众，那种表述者和读者之间自然而然的心心相通的情感没有了，共同的国家民族认同并不

¹费孝通、张之毅，1990，《云南三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第208-212页。

存在。叙述者个人超越地域文化的“全球化”的身份被强化，特别是在美国文化和意识形态之下，单一的学者身份和表述，更容易为人所理解，也更省去一些不必要的繁复的解释……所以英文版在探讨同一问题的时候，则更多地从一种中立的观察和研究者的角度，语气比较“客观”。

然而，这种客观，并不意味着阐述力度的弱化，事实上，由于“中立”的立场，在某些情况下，对于某些问题的强调，更为有力，文中很多简单直白的阐述，可以说是当时中国学者对西方学术界发出的最中国的话语之一。比如在谈到西方工业冲击下的中国农民的状况时，作者说，中国农民“不管他们有多好的技艺，他们都是在跟机器打一场注定失败战争，但他们必须一致打下去，否则，就无法生存……”¹这类表述，可以说振聋发聩。又比如，“……其结果是，中国逐步沦为一个农业国，纯粹而单纯，而一个农业的中国，不可避免地是一个饥饿的中国。”²这种言简意赅又独树一帜的表述，对西方读者具有特殊的冲击效果，因为它与一般西方关于“中国”的联想——比如农业国、农业生产、农业发展意味着富足——不一样，“看起来，指望在不远的将来中国农民能完全依靠农业过活，是不切实际的”³。

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费孝通先生坦诚地宣称，在这里我们关心的不是“理想类型”的工业，不是“最有效率”的工业，我们关心的是一种现实实用的、适合广大农民大众情景的工业类型，因为中国的新工业化，如果简单采用欧美的工业化模式，将会导致中国农村的严重危机，而中国农村如果不能从工业化中受益，也会大大影响中国国内的市场……⁴（英文版没有强调中文版中提到的政治问题）。这些表述，在今天遭遇“三农”困境的中国听来，仿佛是在讲述当下面临的问题和困惑，完全没有60年的时空差距！这种持久的效力，与其说是源于观点的特异，不如说是一种真正立足现实、超然于东西方既成思想之上的思路，以及背后彻底独立的学术价值。

遗憾的是，费孝通等人当时这种忧患和预言，后来一度成为我们国家建设过程中的事实，等于实际上从反面验证了这些命题，尽管事实上我们并不希望这种“应验”。值得注意的是，费孝通等学人的这种思路，从30、40年代的江村、三村研究，到50年代的重返江村，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社会学重建中的乡镇企业、小城镇研究，到80、90年代的区域模式研究、城乡协调发展研究等，直到近年来的文化自觉、文明关系研究以及微观城市社区研究等等，六七十年一贯至今，基本上没有实质变化，而不断变幻的，是中国社会，一直在不同模式之间摆动，中间进行了多少尝试、挫折和成就，经历了多少风风雨雨，事实上却在不断从正面和反面验证这些思路的有效性和前瞻性，已经被证明是真正具有洞察力、先见之明和透析中国深层社会状况的。

七、学术价值

Earthbound China 中对于中国学者和学术界价值理念的阐述，是跨文化学术表达的重要基础，在谈及他本人和他的同事们对这三村研究的目的是，费孝通先生强调了两点：“实际”（practical）和“未来”（future）⁵。

1、学以致用

在当时社会情境下，中国学者毫不回避自己研究的目的在于帮助决策者制定实际政策，这是优化农民生活的实际行动：

“……定义的效度，要靠随之进行的行动来检验。对我们来说，把科学研究和实际政策联系起来，是合理合法的，甚至是根本的。在一定意义上，我们是中国农民的代言人……”⁶

¹ Fei Hsiao-tung, 1975, *Earthbound China*, Chicago: Midway Reprint. 305 页

² Fei Hsiao-tung, 1975, *Earthbound China*, Chicago: Midway Reprint. 305 页

³ Fei Hsiao-tung, 1975, *Earthbound China*, Chicago: Midway Reprint. 308 页

⁴ Fei Hsiao-tung, 1975, *Earthbound China*, Chicago: Midway Reprint. 308 页

⁵ Fei Hsiao-tung, 1975, *Earthbound China*, Chicago: Midway Reprint. 297 页

⁶ Fei Hsiao-tung, 1975, *Earthbound China*, Chicago: Midway Reprint. 297 页

这种鲜明的应用取向的学术价值——公开宣称为影响政治决策而从事研究——具有浓厚和鲜明的中国特点，与中国近现代特有的遭遇和国情密切相连。它与西方一般的学术习惯还是有相当大的不同。中国近现代学术发展，不管什么意识形态，不管什么学科，不管什么学派，其基本的目的，都是探索国家民族的自强之路，这是一种超越学术活动本身的价值取向，它已经构成中国学术的一个基础，30、40年代敌机轰炸下魁阁学人执着的学术努力，正是这种价值的一个最好的缩影，而费孝通先生面对西方读者明确宣示这种学术价值，有利于西方学者和读者理解中国各种学术思路背后更具决定作用的“世道人心”。

2、意义在于未来

费孝通在全书的“结论”中一开始就说明，社会学田野工作，始于假设，终于假设，我们只是为未来开题，随时准备根据新的证据来修正……¹ 换言之，是说三村研究当时的成果并不是最后的结论，它只是为未来更深入地研究的一种铺垫，犹如所谓“抛砖引玉”。这种“谦逊”的态度，一定程度上是出于西方公众和学术界接受程度的考虑。鉴于当时西方社会学研究相对来说比中国要成熟很多，这种完全基于中国经验、但在学科属性上源自西方的学术成果，面临一种两难的处境：作为总体上“不成熟”的、尚处于起步阶段的中国学术，究竟有没有能力向国际学术界提出一些不同于西方基本分类、基本概念、基本范畴的新的概念和框架？这种新的思路，如何表达，如何沟通，如何介绍到国际学术界中去？这种表达，必须不失原意和立场，但又用别人听得懂、能接受的语言，不能完全流于独白式的自言自语……这种两难，不仅是费孝通在 *Earthbound China* 中要面对的，也是中国学术总体上的一种悖论。费孝通的“翻译”实践，可以作为突破这一学术重围的早期经典的经验。

八、结语

费孝通先生80多年的学术生涯，一直是在中国学术和西方-国际学术之间，构建沟通理解之桥。他所面临的问题、境遇和所作的努力，已经载入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和一般社会思想的史册。不断重温、解读和反思这些重要的经验，是一门很好的功课，有助于我们直面当前和未来挑战。费孝通在 *Earthbound China* 的前言中说：“对于东方知识的需求正在增长……东西方不可能再孤立地生存……但是密切的联系，如果没有深切的理解，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灾难”²，和平共处和互相尊重需要一种互相理解。民族之间要想彼此宽容、同情和帮助，就必须具备关于对方“如何生活”、“问题何在”等等基本的知识。而学术工作，可以承担这种传递知识、交流沟通的重要任务。但这种交流，是一项复杂的工程，也是一项艰辛的使命。如果说，三村研究揭示了中国乡村面对西方工业时的特殊处境，中国学术，又何尝不是面临同样的困惑与挑战？如何在这种格局中确立自己的自主性，以一种合适的方式面向世界，这不仅是一个抽象的理念，也是一系列具体的操作化的行动，不管怎样，“让我们承认，我们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³。

1 Fei Hsiao-tung, 1975, *Earthbound China*, Chicago: Midway Reprint. 297 页

2 Fei Hsiao-tung, 1975, *Earthbound China*, Chicago: Midway Reprint. vii 页

3 Fei Hsiao-tung, 1975, *Earthbound China*, Chicago: Midway Reprint. 313 页